

臺大社會系社區

工作團實例

林萬億

一、前言

大學是個獨立的學術機構，過去，它是藉著傳承優勢階層的特殊價值與意識，而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現代的大學受到民主思潮，科技進步的交互影響，不再只是一個具有「社會化」功能的教育單位，而更具備了「選擇」的功能。社會化在於發展個人的附從性及能力，以便扮演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而選擇的功能則是根據社會的結構特性分配人力資源。根據帕森斯（T. Parsons）的觀點，附從有兩類，一是附從於社會的共同價值體系；二是附從於特殊的社會角色。同樣地，能力亦包括「技術能力」與「社會能力」。（註一）

過去的大學常被指責為「關起門來辦教育」，大學生就落得「深鎖在象牙塔裡的一羣」，「官牕深處」造就「一般知識份子優異的次文化（Sub-Culture）」，這股次文化是一系列的信仰、價值、思想方式與行為模式，且異於社會的其他單位。大學的次文化並非全然固著的，在某些特質上與社會其他單位分離，但也部份與社會共同價值緊密結合在一起。大學的次文化不論在形式上或內涵實質上也不斷地在變遷，有因應於大社會的外力作用；有內發的創新力量。

大學生們是社會羣體中的一個過渡。他們屬於任何家庭，也屬於大社會，從家庭到學校，他們從來未曾脫離社區生活而孤立。也許，過去他們視社會中的病態為成人社會的責任，他們寧可潔身而事外，甚而不屑地指責「誰造成了」一個百病叢生的社會給他們」。今天，社會能否提供最舒適的環境，不盡然是社會的責任，而是組成社會的每一份子要參與責任，分享甘苦。大學生們常以

社會清流自居，常以國家棟樑、民族瑰寶自豪。一份樂觀理想主義的精神表現，曾經帶來現實——理想脫節的適應挫折，但何嘗不是邁向更美好社會的崇高極致。我覺得，大學生們在學校與社會的連續體（Continuum）上作最合理的抉擇，是一個時代的價值，適度的分離與整合已不可不慎重。

近十年來大專學生從事社會服務活動，高喊「走出象牙塔」，曾經帶來一股澎湃湧底學生參與運動。他們意識到參與的可貴，他們實踐知識的力量。大學生的自我形象與他人的認知，起了深具歷史意義的改變。今天，大學生們仍然在進行著服務社會的行動。讓我們從社會服務的短暫歷史中來鼓舞現在熱心從事社會服務的朋友們，也激發更多的信心與勇氣。這群傳承大學生實踐理想的青年，他們有志願工作人員，也有為專業社會工作作證的社會工作學習者。

二、學生參與社會服務運動

讓我們從一九七〇年底「保衛釣魚臺運動」憶起。留學生的堅決抗議，掀起了國內大學生們波濤壯闊的愛國運動，雖然短短的一年光景，「保釣」運動已如昨日黃花，但它留下的不是豐功偉業的彪炳績效，而是喚起萬千冷漠、自私的青年心態。讓我們意識到國家是我們的，社會是我們的。在這振臂嘶喊聲中有些青年朋友們走向鄉村，走向荒陬，走向需要關懷的每一角落，展開了一串串關懷社會的花朵。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臺大慈幼會在臺大幾個學生社團共同起創下出現，成為大專院校的第一個學生服務性社團；六十年臺大代聯會發起「社會服務團」，以發掘社會問題向社會弊病進軍為首要目標。在此時臺大天主教光啓社的「社會工作股」也服務於醫院病房中。六十一年度最引人注目的是「百萬小時奉獻」，假如每個臺大學生每週貢獻二小時給社會，則全臺大學生一年就可提供百萬小時給社會。如此，在社會渲染之下，臺大代聯會只好積極籌辦一連串的社會服務。六十二年暑假組成十個服務隊，隔年則分別由各社團承擔繼續的任務，慈幼會則在此時分組義光、廣慈、山服等工作團。此時也就是有名

的「大學生走出象牙塔」高唱入雲之際。六十三年底，這股不曾被懷疑過的「社服」運動第一次受到考驗，「社會服務何去何從？」出自同學的口中，他們驚訝於「披頭」「迷你裙」下鄉；他們反省於「為觀光而服務」。大學生社會服務在懷疑中仍然被熱愛「社服」的朋友們所肯定。六十四年，幾乎所有與社會有關的社團均單獨或聯合成立服務隊：包括農、漁、山地、國中、育幼、殘障等服務隊。現在，他們仍然不懈地進行著接棒的工作。目前最流行的應該是所謂的「國中激勵隊」，其中以臺大臺風社功勞居多。

並非只有臺大的學生在進行社會服務，其他大專院校同時也風起雲湧，像早期成大的「臺西服務隊」、政大的「愛愛會」、輔仁的「同舟社」等等都是社會服務的尖兵，當然還有更多默默耕耘者。

試問，大學生們為何要參與社會服務活動？首先讓我們回憶中國士大夫的傳統觀念，知識份子以國家興亡為己任，這份使命感與責任心，使我們擁有一觸即發的參與潛能。當我們的理想不能直接參與決策時，間接的參與活動未嘗不是一種合理的宣洩。

接著，社會服務使大學生有機會走向社會每一角落，發現社會的現實面，真正將個人與社會結合在一起。如此，還可以學習應變處事的能力；激發解決社會問題的決心；使自己成長，也使被服務的對象獲得關懷。引發社會上優勢層對弱勢階層的注意，形成一種改革的輿論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些熱心於社會服務的青年學生們，我們可以稱之為「志願工作人員」。就專業社會工作而言，是一羣有別於專業的（Professional）的對稱，他們仍然是關心人類福祉、不容貢獻自己的時間精力與個人才能興趣，願意造福社會者。在這段社會服務的熱潮之中，也不乏有曾受過專業社會工作訓練的學生投入，他們在很多服務隊中受到重用。然而，在社會工作專業的立場，所謂專業的條件是區別專業與非專業的指標，在這一點上，專業社會工作者常與社會服務者有角色重疊的混淆現象，主要原因部份是由於社會福利思想的背景使然。在大學裡兩者間也未嘗沒有互斥的事實，社服的朋友們不相信社會工作有多專業；社會工作的學生對社服不以為然。事實上，這是多餘的。社會服務的廣大範圍，人人可做，而大家都在於期望用最有效的方法，達到真正的助人服務，

社會工作者有義務提供專門的技術與理論基礎。

從社會服務的經驗中，社區服務是較不被採用的，曾經有過社區服務的例子不多。較相近的有臺大慈幼會的文賓社區服務；天主教光啓社的福德社區服務，但都不甚理想。他們的理由是社區服務牽涉太廣，非他們能力所及，所以蓋棺論定地說臺大幾乎沒有社區服務了。

三、大學與社區

事實上，社區服務工作並非能立竿見影般地收效。一個大學服務性社團在推行社區服務工作上有其異於一般服務的難度，但也絕非不可能。讓我們先來說出大學與社區的關係，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大學並非只是一所科技人才的訓練中心，而也是一個參與社區的主體。大學與社區關係若從區位分佈來看，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大學與所在地社區的關係，此時，大學可以稱為社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負責推動社會中心教育。在美國某些初級學院（Junior College）發展之快，主要乃在於其能適合社區民衆的需要，所以有人稱之為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註11）；另外一種關係建立於大學主動地參與其他社區，提供社區發展的技巧與資源。以目前大學分佈的情形為例，都市大學較多，它們所在地不一定適合社區發展工作，以臺北市所定義的社區常是小型的，在這些社區中，東吳大學與臨溪社區；臺北醫學院與新工社區，關係上應屬於前者，而師範大學與樹德社區或臺灣大學與新工社區則屬於後者。

以上兩種學校與社區的關係都可能建立示範社區（Pilot project Community）以作為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oratory）供研究、試驗、訓練和服務之用。關於實驗社區的概念，它是一種由政府、民間、與學術機構、學者專家等通力合作，從社區之選定、調查、設計，到工作之推動、社區事務之進行，均按照學理，逐步完成。此社區可作為其它地區之人民或其它社區之模範及

觀摩對象。其對社區發展之主要意義如下：(1)可提供一套有效可行的工作方法，以供其它地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之參考。(2)可作為其它社區之觀摩學習對象。(3)可供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作為教學實習之場所。（註12）

20年代我國首次運用社區發展方式來推動鄉村建設，這項運動的目標在協同解決四種重要的社會問題：貧、愚、弱、私。其間進行最完善的首推燕京大學的示範社區。這個社區建立在清河鎮上，共有四十鄉村和二萬人口，示範社區不但利用燕大各院系的教授和學生，如社會工作系、經濟學、教育系、政治系和家政系等，而且也利用北平其他大學，特別是北平協和醫院和北平助產學院。示範社區除了改進已有服務設施和創辦農業、經濟、教育、健康與福利工作外，最大的成就在證明大學對地方社區應作何事，方能使其教學與實際生活和實際情況更為接近，並證明大學在其所座落的社區的地位與責任。示範社區的成就還包括：(1)激發大學生對於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感和實際行動；(2)對於人民、政府和其他有關機關團體證明了互相聯合工作可以成為改善鄉村生活情況的主要力量（註13）。

政府播遷來臺，勵精圖治，久被淡忘的示範社區又因聯合國的推動社區發展，而在臺灣掀起另一次高潮。張鴻鈞先生建議臺北市研訂社區發展示範計劃，由臺北市府及臺灣大學、師範大學與中興大學合作推行，所訂示範計劃包括：(1)試驗和表證一種廣泛都市發展方案的組織、行政、內容和方法；(2)創設社會實驗室充作三大學調查研究訓練學生之用；(3)服務居住在示範區域內的民衆（註14）。這項計劃於五十六年開始示範社區之建設，而於五十四年起，臺北市已先在南機場與聯勤總部合作，成立「臺北市南機場社區發展實驗中心」，後來由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主持社區調查與實施。接著五十六年起兩年之內臺北市共建設示範社區十四個，遍佈每一區，這些社區並不盡然有大學參與，即有參與也可能僅止於調查。這一段期間內產生之社區調查有龍山區新富社區（中興大學），松山區西松、正和社區（臺灣大學），松山區富基社區（臺灣大學），古亭區林口社區（中興大學）。其實，我們可以說臺北市之示範社區計劃並未真正與三個大學澈底合作。稍後，臺中市政府與東海大學社會系合作推

行都市社區發展實驗計劃，以臺中市西屯區何厝、何安兩里開始實施。這是較具規模的一次合作行動。

近年來，臺北市社區發展示範計劃又有了一些實際的行動，六十四年東吳大學以其所在地的臨溪社區為範圍，開始了一次新的嘗試，由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協助，進行「大學社區發展實驗」，以期實現「大學實驗社區」的構想。這項研究的目的有三：(1)測驗由大學協助地方人士辦理社區發展，是否正確有效；(2)了解大學與其在社區的關係；(3)在大學內，為社會訓練培養社區發展工作之推廣人才（註六）。此後，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在大安區新龍社區成立另一項實驗，研究志願工作者參與社區發展的可能性。其目的在於了解志願工作者可否在專業人員之指導下，擔任社區發展之先驅人員（註七）。師大主持「新龍社區」之前曾在中山區永安與大安區黎和兩社區服務過。

四、臺大社會系新工社區工作團

在社會服務浪潮的衝擊下，我們常埋怨社服的朋友們沒有善用專業的工作技巧；也常指責他們不聽專業的勸告。然而，他們也在責怪為何學社會工作的却很少投入「社服」，其實，有愛心、耐心的社會服務朋友們，不一定願意接受助人的信心與專業的良心。當然社會工作的同仁們能接受社會服務的熱忱，更願激發普遍社會服務的風潮，但不可能以熱心、愛心的態度來滿足自己的學習歷程。他們更需要為專業社會工作作證，以實地的工作經驗來配合理論；他們更願以學習獨立而能協調的工作態度來推展一個屬於自己領域的社會工作模式，尤其社會工作本身是一個動態的、協調的、合作參與的學科，不容許閉門造車，要成為助人的專業，不能不深入了解人類的行為與社會環境，正好社區工作可以包含個案、團體兩種工作方法，可以不偏頗，對於社會工作學習者是非常重要的。更進者，經由一個因工作而結合的團體，同學間可以相互砥礪，可以在工作中使專業的認同提高，成為一個推動社會工作合作的變遷媒介。

基於對社區工作的反省，六十六年四月間，筆者接受「實驗社區」的構思督促，糾合了幾位有志一同的同學，開始宣傳、遊說，為「社區工作團」催生。同學們好奇地加入，王培勳老師答應給予技術指導，章英華學長也加倍鼓勵。在此時，失敗的可能如影隨形，經過幾位同學不斷地研擬，一些概念和屬於工作計劃的理論架構才慢慢推演出來。但是，那畢竟是零散的，每一位同學都感到所學專業知識的貧乏，對於工作經驗也是一無所有，我們迫切地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們先後邀請社會局前五科科長彭永寬先生為大家提供臺北市社區發展概況。也請王培勳老師就大學實驗社區作詮釋。另一方面，也進行人力的組織與資源的接洽申請，由王培勳老師引介二千五百元的經費援助，並商請臺大慈幼會給予支援。

經過這一段蘊育的階段，暑假開始即積極成立「社區發展志願工作團」，先與臺大慈幼會合作，組成工作核心小組，積極展開各項工作。首先獲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五科的支援，讓我們有充分的自由選定社區，經參觀了幾個社區，以及衡量當時之需要，選定松山區吳興街臺北醫學院一帶剛成立不及一年的新工社區，是一個眷區、住宅綜合的新社區，松山區公所也極力贊成，並給予可能的行政支援，社會局並擬將之列為「示範社區」。此時社區工作團已有十多團員，逐漸有能力成立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我們也開始學習自我訓練。由核心小組自行籌辦討論會以溝通社區發展的基本認識，並請陸光教授主講「志願工作者如何參與社區發展」。

凡事起步難，經過一個暑假研擬，決定儘速完成一份工作團實施計劃，以便按計劃逐段實施工作。筆者參考諸文獻，完成一份初步的計劃書，以結合志願服務同學，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直接參與社區發展工作，以證實社區發展專業人員在社區發展工作上的有效性，並為社會工作學習者提供學習機會，激發學習熱忱為宗旨。計劃定為一年，計劃工作內容為三期，第一期為籌備階段，工作項目為(1)充實知識；(2)結合志願工作者；(3)成立工作團組織；(4)訪問社區領導人士；(5)動員社區資源。第二階段為執行階段，工作內容為(1)舉辦社區調查；(2)協助社區理事會決定工作原則；(3)根據資源配合需要完成初步活

動規劃；(4)宣導；(5)協助設置社區活動中心；(6)配合社區需要展開各項活動；(7)檢討評價。第三階段為轉移階段，工作包括(1)建立社區活動基本組織；(2)移贈社區公物；(3)諮詢與聯誼。

六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社區工作團」成立大會，推選為計劃協力奔走的黃清高同學為團長，第一階段工作完成。筆者開始着手製作社區調查問卷，並請張曉春老師指導進行社區調查工作。在此之前並指定同學至松山戶政事務所抄錄社區人口資料，完成資料卡一千四百餘張。社區調查採系統抽樣，由團員進行訪問問卷法，並由筆者主持資料分析，提供活動籌辦的基本根據。第二階段工作並於除夕舉辦社區兒童聯歡晚會，在臺北醫學院舉行，報名兒童五百餘位，當晚大雨傾盆，但仍有三百名兒童冒雨參加，臺北醫學院同學也同時投入為社區服務。第二項活動，為二月一日起三天的社區青少年冬令營，仍然在北醫場地舉行，在這兩次活動中，讓社區理事會、家長、兒童、青少年們察覺到有社區活動的重要性。此後，社區工作團面臨新的挑戰。

五、社區青少年育樂活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重視我們的工作，委託我們成立「社區青少年服務團」，這是根據「臺北市政府輔導各級學校成為文化精神堡壘實施要點」及「臺北市立各級學校開放場地實施要點」辦理。目的在運用社區發展的方法，由大專院校社會系及社教系教授指導學生，會同大專社團學生協助社區內市立學校，輔導社區理事會，推行社區青少年育樂活動，使學校成為文化精神堡壘。以組織發展青少年為工作核心，進而運用青少年力量謀求社區居民知識能力之增進，生活素質之提高，以宏揚社會教育。這項計劃名為「社區青少年育樂活動計劃」，並選定「新工社區」(臺大社會系負責)、「樹德社區」(師大社教系負責)先行實驗，探討各項社區青少年育樂活動之可行性，並進而規劃整套作業程序，建立模式，俾使各社區參照施行。預定實施一年後，舉行示範觀摩，視

試辦成效良好，再由點到面，在臺北市十六個行政區內普遍推行。

工作團為了配合這項實驗計劃，而將原來組織改變。由服務對象之年齡分組，改為以活動類屬分組，設活動、行政兩部門。活動又分文教、社教、團康、社會工作四組，分別以各種活動來達到預期目標。此時社工團亦改選，由劉淑瓊同學擔任團長。四月，我們擬定新的活動計劃，以配合新的工作目標，計劃預定舉辦二十四項單元活動，從六十七年七月一日至隔年六月三十日止，活動內容包含適合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德、智、體、羣、美五育並進的活動，尤其希望藉由活動中發掘社區青少年領袖，成立社區青少年會，以達到自動自助的最後目標。

從社工團改組至推展青少年活動之間除了一面進行計劃籌備外並舉辦一次社區婦女麵食點心教做，由麵食推廣中心提供技術指導。並在四月底舉辦團員訓練，稱「萬里春令生活營」，自我磨練工作能力與服務態度。七月一日開始舉辦以青少年為對象的社區活動，到目前有國中暑期英文基礎班、如何利用暑假座談會、課外讀物、優良影片欣賞、參觀天文臺、參觀國父紀念館匪情資料室、登山健行、社區籃球比賽等八項單元活動。最近並擬將寒假活動統合為密集之系列活動，預計三次完成衛生週系列活動，包括健康檢查、衛生常識、生理、心理健康之認識等和土風舞教學、興趣小組單元、人際關係訓練、趣味競賽、登山踏青、唱和跳、體育時間等納入三天的冬令週末營活動，有系統地推出，並適時成立社區青少年會。這些活動分別由本團協調臺大社團與北醫社團共同完成。

社工團由一文不名到現在獲得教育局十二萬五千元活動經費支持；從零散的組織到健全的制度；從核心小組到擁有七十人的社團，同學們的辛勞投入，功不可沒。對於任何從事社會工作或社會服務的朋友們，這都是一種經驗與鼓勵。現在，新工社區理事會改選了，有更多理事願積極從事社區發展工作，社區理事會也主動舉辦各項活動配合「全民運動」示範。社區青少年活動的實驗計劃也決定延長一年試驗，下一年度，我們期望由社區的國中能以指導活動室的力量承擔起此項活動計劃。然而，這需要另一種層次的價值體系來溝通，讓我們也來了解學校——社區——學生三者的關係。

六、由社區學校推動社區發展

學校對社區發展的貢獻，毫無疑問的是有其多面性的，首先學校課程可以配合社區發展的需要，以培養良好的社區公民與生產者；同時學校還可設計專門的課程，培養社區組成份子參與社區發展工作的意願及能力。其次，學校培養各類社區發展的領導人才。再者，在社區發展過程中，學校可能成為社區的教育及各類活動中心。學校一方面可使其資源為社區所利用，另一方面可在假期或正式教育活動之外的時間，成為社區活動的推廣場所。（註八）

1938年艾維特（Samuel Everett）發表「社區中心學校」一書，首先對社區中心學校作有系統的研究，其後柯克（L.A. Cook）和奧爾生（E.G. Olsen）加以闡揚。柯克以為任何學校只要能實現下列目標，便是社區中心學校。第一，教育青年，使盡量參與生活各方面的活動。第二，不斷努力，使校內外民主化。第三，在教學方面，運用社會資源。第四，主動與社會機構及團結合作，改善社區生活。第五，使學校成為服務青年及成人集團的中心（註九）。社區中心學校的觀念在臺灣地區推行亦有多年經驗，民國五十九年間，臺灣省政府推行重要施政分區實驗示範，由新竹、屏東兩縣依據學校辦理社會教育及社區發展有關法令，以「各級學校加強推行社會教育」為實驗項目，以國民中學為鄉鎮（市、區）之教育中心，以國民小學為社區（村里）之教育中心，以達成「政教合一」、「建教合一」、「社教合一」、「文教合一」之目標（註十）。民國六十年十二月臺灣省教育廳又頒定「臺灣省各縣市國民中、小學配合社區發展推行精神倫理建設計劃」，六十四年一月至三月間先後再頒「各級學校加強辦理社會教育推行消除僻陋宣導示範考核要點」，「各級學校加強推行小農計劃實施要點」和「各級學校開放學校場所實施要點」等法令。由此可知教育單位與社政單位謀求學校與社區結合的努力。

但是，目前社區學校對社區提供服務並不多見，在學校組織中，參與教師

與學校行政人員應當都是最好的社區積極參與者，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無法達到這種理想，可是目前推行指導活動方案，學校指導活動人員應比其他老師更接近社區，甚至可以說學校的社會工作員猶如一位社區組織者（The School Social Worker as Community Organizer），他經常可以使用社區組織的方法，處理與學校行政人員和學生家長、學生之間的關係，然而，他也必須以不同的程度參與社區組織的工作（註十一）。一位學校社會工作員對社區有關人士的工作包括：（1）促使教育行政暨學校人士了解社區有關資源；（2）與教育局「學生輔導處」、「衛生督學」以及其他機構人員連繫、協調與合作；（3）參與社區衛生、福利和其他機構的會議，以合力推行社區衛生、教育與福利工作推廣計劃；以及（4）參與社區服務中心的青少年服務計劃和社區對兒童保育工作（child care）的有關服務計劃（註十二）。美國學校社會工作專家 Lela B. Coslin 在其研究中也一再引述學校社會工作員的職責應包括連續家庭與社區機構的功能（註十三）。所以他更提出現代學校社會工作的新模型應是學校——社區——學生的關係系統，有別於傳統的個案工作方法模型（註十四）。學校機構常是社區工作員發掘社區資源、利用社區資源的最有效客體，雖然不可能每一個社區均有一所學校，但是任何學校應義不容辭地投入社區發展中，而且應由一個社區逐漸地擴展泛社區。我們以為社區的理事會諸君們眼見一羣活潑可愛的年輕朋友們，利用有限的時間、精力、金錢在為社區服務，他們應不只坐享其福，而更自覺地負起主動協調的責任。社區工作員也應客觀地認識社區發展與社會教育目標是殊途同歸；社區發展與社會教育實施宜互助合作（註十五）。而學校的老師們也能意識到本身的社區責任感，尤其是指導活動室的社會工作員或輔導員，更應是一位積極協助社區活動者，即使主動催化社區活動的運行亦不為過。

七、結論與建議

1890年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未產生前，社區組織的參與者端賴志願工作人

員的干預，1920年以後專業教育發展，取代了志願工作人員的社區責任，但志願工作人員並未因此而減縮，1955年葛拉瑟 (Melvin A. Glaser) 指出志願服務將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份，他相信1950年代以來志願服務人員的膨脹，並不會造成專業社會工作人員的危機，而應是一種時勢的必然。在英國，早年大學生們致力於倫敦東區的社會改革而有湯恩比館 (Toynbee Hall) 之產生。在印度，近年來大學生更推動了社區建設，甘地吉 (Gandhiji) 認為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和文明的傳遞者，新一代社會工作專家如瑪嘉德 (Krishna Majumder) 者，都極力鼓吹大專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她們以為假如研究成為大學青年唯有的目標，則他們必終生不知覺有社會問題，所以認為大學青年應經常與現實社會保持接觸，參與社區生活，因為社區服務而填補現實與理想之差距。假如一個大學青年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裏，則最後必導致不滿現實而怨恨、厭惡和不安。社區服務可分機遇式和季節活動兩種，這種社區服務的推廣，勿寧說是印度社區建設的媒劑 (註十六)。

我國大專學生參與社會服務至今，呈現兩種明顯的趨勢，一是在育幼院裏進行課業輔導與康樂活動；二是到偏遠地區進行綜合性服務。沒有很雄厚的人力、財力是不便到遠方去自我奉獻，所以很多社團均集中於部份育幼院中，形成人力浪費，服務分配不均。假如每個大專社團能把焦點放在自己的四圍，形成就近服務。不但可以降低社會服務成本，而且相互協調支援，對推動計劃變遷的媒介功能更能發揮盡致。我們更期望社區學校的指導活動室能接棒，把社區青少年活動辦好，藉着他們有利的地位，推動由青少年為主的社區活動，漸漸擴及社區居民的整體發展。社區理事會也必須主動推動一種氣氛，由居民自己服務自己。如此，社區的精神倫理建設才能迎頭趕上，社區才能達到經濟——社會平衡發展。

附註

(一) 林清江，教育社會學，國立編譯館，六十四年八月，第七五頁。

(二) 許水德，以社區為中心做好中華文化向下紮根的工作，社區發展季刊，第三號，六十七年一月，第四十五頁。

(三) 王培勳，社區發展問答。六十二年，第三十三至三十四頁。

(四) 張鴻鈞，張鴻鈞先生社會發展言論彙編，六十三年，第七十九至八十頁。

(五) 同註四，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頁。

(六) 楊懋春：大學社區發展實驗研究報告。六十四年，第八頁。

(七) 陸光：社區發展與志願工作者之參與研究報告。六十四年，第二十六頁。

(八) 同註一，第二六二至二六三頁。

(九) 蔡漢賢主編：社會工作辭典。「社區中心學校」六十四年第二十六頁。

(十) 梁尚勇：臺灣省學校參與社區建設工作的策進與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二號，六十六年九月，第六十三頁。

(十一) J.C. Nebo: "The School Social Worker as Community Organizer" Social Work January 1963 PP 99-104

(十二) 廖榮利：學校社會工作的基本概念，社會學刊，第十期，六十三年七月，第一一三至一一〇頁。

(十三) Lela B. Costin: "an analysis of the tasks in School Social Work" Social Service Review, 43 (September 1969) P. 247-285; John J. Alderson and Curtis H. Krisher, "Another Perspective on Tasks in School Social work," Social Casework 64 (December 1973) PP 591-600; Paula A. Meares, "Analysis of tasks in school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May, 1977 P. 196-201。

(十四) Lela B. Costin "School Social work Practice: a new model", Social Work, March 1975, P. 133-139。

(十五) 李建興：社會教育與社區發展，六十二年，第二〇至二二頁。

(十六) Krishna Majumder: "Youth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mmunity: motivation in Compulsory Community serv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971, P. 12-16。